

郭沫若 作品经典

第二十九册我怎样写《青铜时代》和《十批判书》



二十世纪
中国文学大师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GUO MO RUO ZUO PIN JING DIAN

郭沫若作品经典

第二十九册

我怎样写《青铜时代》和《十批判书》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郭沫若作品经典/郭沫若著. —北京:

中国华侨出版社, 1996

ISBN 7-80120-116-7

I. 郭… II. 郭… III. 文学-作品综合集-中国-现代 IV. I217.2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6) 第 15752 号

郭沫若作品经典

著 者/郭沫若

编 者/郭平英

责任编辑/江淑娟

装帧设计/李志国

版式设计/林 达

责任校对/孙岳奇 雷一平

经 销/新华书店总店

印 刷/北京社科印刷厂

开 本/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/93.5625 字数 2033 千

版 次/1997 年 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邮政编码:100028

ISBN 7-80120-116-7/I·27

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

东里 77 号楼底商 5 号

定 价:110.00 元

我怎样写《青铜时代》 和《十批判书》

• 本篇系《十批判书·后记》，收入本卷时将原副题《——我怎样写〈青铜时代〉和〈十批判书〉》移作正题。

小时四五岁起所受的教育是旧式的,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每天必读,虽然并不怎么懂,但毫无疑问,从小以来便培植下了古代研究的基础。

我和周、秦诸子接近是在十三四岁的时候,最先接近的是《庄子》,起初是喜欢他那汪洋恣肆的文章,后来也渐渐为他那形而上的思想所陶醉。这嗜好支配了我一个相当长远的时期,我在二十年前曾经讴歌过泛神论,事实上是从这儿滥觞出来的。

在《庄子》之后,我读过《道德经》、《墨子》、《管子》、《韩非子》。对于《墨子》我从前也曾讴歌过他,认为他是任侠之源。《墨经》中的关于形学和光学的一些文句,我也很知道费些心思去考察它们,就和当时对于科学思想仅具一知半解的学者们的通习一样,隐隐引以为夸耀,觉得声光电化之学在我们中国古人也是有过的了。

十七八岁时做过一些诸子的抄录,把警粹的文句摘取下来,目的自然是在供给做文章时可以运用的辞藻(五年前我曾经回过我峨嵋山下的老家,发现了这样的抄本,现今我还把它保存着在)。

这些虽然说不上是研究,但也总可以说是我后来从事研究工作的受胎时期了。

我是生在过渡时代的人，纯粹的旧式教育在十二三岁时便开始结束，以后便逐渐改受新式教育。尤其在一九一三年出国，到日本去留学之后，便差不多完全和旧式教育甚至线装书都脱离了。

在日本的学生时代的十年期间，取得了医学士学位，虽然我并没有行医，也没有继续研究医学，我却懂得了近代的科学研究方法。在科学方法之外，我也接近了近代的文学、哲学和社会科学。尤其辩证唯物论给了我精神上的启蒙，我从学习着使用这个钥匙，才认真把人生和学问上的无门关参破了。我才认真明白了做人和做学问的意义。

学生时代完结（一九二三），中国大革命的浪头逐渐高涨，解放祖国应该是每一个中国人民的使命，一九二六年我便参加了北伐。不幸仅仅一年多，我又不能不向日本去度亡命生活了。

亡命生活又是十年，在日本人的刑士宪兵的双重监视之下，我开始了古代社会的研究。为了研究的彻底，我更把我无处发泄的精力用在了殷虚甲骨文字和殷、周青铜器铭文的探讨上面。这种古器物学的研究使我对于古代社会的面貌更加明瞭了之后，我的兴趣便逐渐转移到意识形态的清算上来了。

在一九三四年与三五年之内，我写了些关于屈原的研究和一篇《老聃·关尹·环渊》，还有是用日本文写的《周易之制作时代》和《先秦天道观之进展》（日本文原名为《天之思想》）。这后两篇由我自己译成了中文，曾经有单行本问世，现在我已经把它们收在《青铜时代》里面去了。

一九三七年我写过一篇《驳“说儒”》，是反驳胡适的《说儒》而作，原名为《质问胡适》，曾在钱亦石兄所主编的《中华公论》上发表过。发表当时，适值芦沟桥事变与八一三战役的爆发，时代

的大波澜把它湮没了，未曾获得世人的注意。往年我曾经把它收进《蒲剑集》，新近我也把它收进《青铜时代》里面去了。

芦沟桥事变使我结束了十年的亡命生活，回到祖国，接着便忙于抗战的宣传，把学术研究工作便又完全中断了。

我的从事古代学术的研究，事实上是娱情聊胜无的事。假如有更多的实际工作给我做，我倒也并不甘心做一个旧书本子里面的蠹鱼。然而时代毕竟善于调侃，回国以来转瞬八年，时局尽管是怎样繁剧，国内国外都是一片烽火连天，而我在最近的两三年间却又得到了充分的闲暇，使我走起回头路来。

我写了六种历史剧，写作的经过，我在每一个剧本的后记里面都有详细的叙录，不必在这儿重提。我在这儿很想把两个学术论集——《青铜时代》与《十批判书》——的各篇的写作过程叙述一下。上面所提过的在日本写出的几篇，因为当时的日记已被丢在日本，写作的记忆已经模糊，我可以不用再缕述了。

回国以来担任了将近三年的宣传工作，后来又被改任为文化工作委员会的主任委员。五年来的“文化工作”最近告了结束，我这两个集子也不先不后适在这时完成，倒也是值得纪念的事。但我也须得多谢文工会的一些朋友们，是他们没有让我过问会内的杂务，使我得集中精力读书。又因为每星期的纪念周须得有工作可以报告，我便把朋友们作为对象，火迫地赶写了一些文字出来以供报告的资料。看是凑巧，今天我的工作刚好告了一个段落，而文工会也被迫解散了。多年朝夕共处的朋友们要向四方分散，这一事，实在不免使我增加回忆。

同处在一个环境里面，大概是不能不感受同一风气的影响。历史研究的兴趣，不仅在我一个人重新抬起了头来，同一倾向近

年来显然地又形成了风气。以新史学的立场所写出的古代史或古代学说思想史之类,不断地有鸿篇钜制出现。这些朋友们的努力对于我不用说又是一番鼓励。我们的方法虽然彼此接近,而我们的见解或所得到的结论有时却不一定相同。我不否认我也是受了刺激。我的近两三年来的关于、周、秦诸子的研究,假使没有这样的刺激或鼓励,恐怕也是写不出来的。

我比较胆大,对于新史学阵营里的多数朋友们每每提出了相反的意见。我坚持着殷、周是奴隶社会,重新提出了更多的证据和说明。我对于儒家和墨家的看法,和大家的见解也差不多形成了对立。我自然并不敢认定我的见解就是绝对的正确,但就我所能运用的材料和方法上看来,我的看法在我自己是比较心安理得的。

秦、汉以前的材料,差不多被我彻底勦翻了。考古学上的、文献学上的、文字学、音韵学、因明学,就我所能涉猎的范围内,我都作了尽我可能的准备和耕耘。

说陈腐了的一句老话:人生如登山。今天这句话对于我却有了新的意义。登山不纯是往上爬,有时候是往下窜。爬过了一个高峰要到达另一个高峰,必须窜下一个深谷。今天我或许已窜到了一个深谷的绝底里,我又须得爬上另一高峰去了。而比较轻快的是我卸下了一些精神上的担子,就是这五十年来的旧式教育的积累。

虽然也有人说我已经老了,但我自幸还没有那样的自觉。再能活多少少年我不知道,我也无须乎知道。我能再活多少年,我就要再学多少年。我的学习的兴趣并没有减衰,不要让它减衰,无疑也就是我活在这人世上的一部分责任。

以下让我根据我的日记,追述我这两三年来的研究经过。

二

起初是一九四三年的七月尾上，于怀兄要我为《群众杂志》写文章，我答应写一篇关于《墨子》的东西。那年有所谓“热气团”通过重庆，我从七月二十六日起便中暑发烧，一直到二十九日正午“热气团”过了，我的烧才退了。三十日挈眷下乡，移住赖家桥。这是每年的惯例，就象候鸟一样，冬天冷的时候住城，夏天热的时候下乡。

赖家桥在成渝公路上，离城四十多公里。桥东不远的公路旁边有一家相当宽敞的农家院子，做了四年半的文工会的在乡地点。就在这院子里面，我把一间原是堆稻草杂具的四面土墙的房屋改修了一下，开了一些窗眼，围了一圈篱栅，也就自成了一个小小的院落，我就住在这儿。

这院子我相当喜欢，特别是门边的一株大白果树最使我留恋。白果树在重庆附近是不容易见到的，而那株树子特别高大，论年龄总当得在百年以上了。夏天，它是我一位无言的伴侣，树如有知，至少我一半的甘苦它应该是知道的。

下乡的第二天，七月三十一日的日记上，这样写着：“读方授楚《墨学源流》，仍在梁（启超）、胡（适）余波推荡中，在打倒孔家店之余，欲建立墨家店。杜老以为最平允者，其实际不过如此”。杜老是杜守素兄，日本留学时代的老同学，兼三厅以来的老同事，他是墨学研究的专家，而且是相当崇拜墨子的人。只有在这一点上我和他的意见不十分一致。他的生活很艰苦，我们有时戏称他为“墨者杜老”。

墨子，我在前面说过，我在小时也曾经崇拜过他，认他为任侠的祖宗，觉得他是很平民的、很科学的。那时的见解和时贤并没有两样。但约略在二十年前我的看法便改变了。我认为他纯全是一位宗教家，而且是站在王公大人立场的人。前后看法的完全相反，在我是有我的客观根据的，我并没有什么“偏恶”或“偏爱”的念头。我的方法是把古代社会的发展清算了，探得了各家学术的立场和根源，以及各家之间的相互关系，然后再定他们的评价。我并没有把他们孤立起来，用主观的见解去任意加以解释。

继续温习了几天的《墨子》，在八月四日的日记里写着“开始草《墨子的思想》得十页”这么一句。五日依然写着“草《墨子的思想》”。六日写着“将《墨子的思想》交人录副”。

“墨子的思想”是我这次恢复诸子研究的第一篇文章，就这样费了两天工夫把它写成了。

由于研究《墨子》引起了对于吴起的同情。吴起本是儒家，由魏入楚，辅助悼王变法，不幸遭了贵族们的反对。在悼王死时，他便被一些反动的贵族们射杀了。在这贵族中有一位阳城君，而他的老师却是墨家钜子孟胜。在这个故事里面，我看出了儒、墨斗争的政治化。因此在八月十二日的日记里面记着这样的话：

“对吴起发生兴趣，将《吕氏春秋》中关于吴起的故事抄出。读《吴子》，乃伪托。《艺文志·兵权谋类》本有‘《吴起》四十八篇’，但今传本仅《图国》、《料敌》、《治兵》、《论将》、《应变》、《励士》六篇，大率托为吴起与魏文、武二侯之间答，毫无精义。《治兵篇》中竟有‘左青龙，右白虎，前朱雀，后玄

武’之语，妄甚。殊感失望。”

酝酿了一个星期，我在二十日便“开始写吴起”。

二十一日的日记又这样写着：

“晨起极早，天尚未明，乃于菜油灯下续草《述吴起》。时复出步中庭，月正当天，颇为明朗。早饭后复就寝移时，始解去困倦。将《论语》温习一遍，看孔子对于军事与政治之主张。‘足食足兵’、‘世而后仁’、‘教民即戎’等，应即吴子思想之渊源。续写《述吴起》，至午后四时顷完成。稿约一万二千字。”

这以后有几天工夫专门研究建安文学，到二十七日又“查《史》、《汉》，获得若干资料，拟写《秦汉之际儒者参加革命之史实》”。这，仍然是《墨子》研究的补充，因为时贤有的主张墨家曾参加陈涉、吴广的农民革命，陈、吴失败，故墨家因而灭亡。但考之史籍，毫无迹象可寻。反而是墨家以外的各家都曾有参加革命的人物，而以儒者为最多。

二十八日“开始草《秦楚之际的儒者》。”

二十九日“续草《秦楚之际的儒者》。午后草成，得十五页，七千字。此为意外之一收获。”

就在写完《秦楚之际的儒者》的同一天晚上，我的兴趣又被吸引到了音乐问题上去了。因为儒、墨之间所争的主要问题之一便是音乐，我须得彻底根究一下儒家方面对于音乐的见解究竟是怎样，因而公孙尼子的《乐记》便上了我的研究日程。

研究《乐记》费了好几天的工夫，我曾经参考着《史记·乐书》、《荀子·乐论》及其他有关文献，把《乐记》按照着刘向《别录》的原有次第加以整理，整个钞录一遍。一切准备工作停当了。

九月四日“夜，开始草《公孙尼子与其音乐理论》”。第二天也就把它完成了。

九月七日的清早，我到金刚村去访问杜老，他依然辛勤地在研究着墨子。我看见他的书架上有一部钱穆著的《诸子系年》，便向他借阅。这书我是早就闻名的，但还没有看过它的内容。翻到了考证公孙尼子的一节，作者的意见和我所见的完全相反。他认为《乐记》是抄袭《荀子》、《吕览》、《毛诗》等书而成的东西，因而他断定公孙尼子为荀子的门人。我感觉着这样的论据实在是薄弱得可笑。

八日“夜，临睡前，草《公孙尼子追记》千余文，驳钱穆之说。冰藕一大碗，立群恐其久留变味，乃啖食之几尽”。

三

把《公孙尼子》写好之后，我的兴趣又掉换了一个方向。九月十三日的日记这样写着：

“读《吕氏春秋》，初意欲收集关于惠施之材料，忽尔意动，欲写《吕不韦与秦始皇》，写此二人之斗争。吕不韦当为一非凡人物，汉人名之为‘杂家’，其实彼具有集大成之野心，儒、道、墨、法，冶于一炉，细心考之，必有所得。”

接连几天，翻来覆去地把《吕氏》读了好几遍，我的一贯的方法是先就原书加以各种注意的标识，再备一个抄本把它们分类摘录下来，这样在下笔的时候，便可以左右逢源了。

开始写作是在九月二十五日，至十月三日夜完成：竟成了四万字左右的长文。

在写作当中，便是十月二日，偶然在报上看见中大出版的《社会科学季刊》的广告，中有程憬《秦代政治之研究》一文，当即以电话通知城内的友人，托为购买，第二天便得到阅读的机会。我的日记里这样写着：“程文歌颂嬴政，有意阿世，意见与余正反，毫无新鲜资料。”

在这之后，我曾经“打算开始写《荀子与韩非之比较研究》或《子思孟轲之思想体系》，又想把《庄子与惠施》作一彻底之清算”。——十月四日的日记里这样记着。这三项课题虽然也酝酿了几天，但都没有照原订计划进行，而我的注意力专门集中到韩非子身上去了。

从十月十日起又开始读《韩非子》，翻来覆去的读了好几遍。要征服《韩非子》却费了很大的力气。第一，《韩非》书很窜杂，有好些不是他的文章。第二，真是韩非的文章如《五蠹》、《显学》之类，完全是一种法西斯式的理论，读起来很不愉快。因此我读得非常的勉强，象“不愉快”或“愈读愈不愉快”这样的话，在日记里屡见。

写时也很感困难。先想从真伪的考证入手，每篇文章都一一加以考核，也着手写过十几页。但那样必然成为枯燥无味的学究式的流水帐，而且必然愈拖愈长，我自己的兴趣不容许我写那样的文章，结果我中止了。

还有使我的工作不能不中止的原因，是乡下渐渐寒冷了起来，而立群又将作第四次的分娩，我们又不能不作进城的准备了。

进城是在十月二十二日。计在乡间一共住了三个月，算写好了四篇文章，《韩非子》的研究在中途抛了锚。

这一抛锚经过了相当长的时间，一直到去年（一九四四）的一月十二日又才“开始草《韩非子的批判》”。二十日的夜间写成。这个使我不愉快的《韩非子》，和我足足纠缠了三四个月，但到写好之后自己也认为“清算得颇为彻底”。

不过在入城后的这三个月的期间，立群产了一个男孩，我在左边的鼻道里生过一次疮。这些当然也要分担一点耽误了时间的责任。

我的《韩非子的批判》，仍然采取的单刀直入的办法，废弃了最初预计的考证式的打算。但从这预计中有一篇副产物值得提起的，便是《韩非子“初见秦”篇发微》，这是十二月十七日写成的。我认为《初见秦》是吕不韦所作。这个副产物也是从乡下带来的胎儿，十月十三日的日记里有这样的一段：

“心境颇寂寞，不愉快。勉强读《韩非子》，除《解老》、《喻老》之外，大率全部温习了一遍。其中确有不能一致之处，不知系韩非前后不同之主张，抑系他人文字有所窜入。确为窜入者如首篇《初见秦》即毫无疑问。此篇必作于秦昭王时围邯郸失败事之直后，或疑乃蔡泽或其徒所为。依余所见，实吕不韦所作也（下列论证颇长，已见《发微》中，今从略）。 ”

把《韩非子的批判》写完了的同一天（一月二十日），日记里面又写着：“明日起拟写《周代的农事诗》”。这是一个新的方面，我的念头又转换到社会机构的清算上来了。好多年辰以来，研究古代社会的人，意见不一，但大多数认为周代是封建社会，我是

不赞成的。主张封建说的朋友们,对于我的奴隶社会说,自然也不赞成。我现在想从周代的农事诗来证成我的说法。但这篇文章,事实上是一月三十日才开始写的,断断续续地写了一个礼拜,就是收在《青铜时代》里面的《从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》。

在这前后,我以偶然的的机会得以读到清初的禁书《剿闯小史》的古抄本。明末农民革命的史实以莫大的力量引起了我的注意。适逢这一年又是甲申年,是明朝灭亡的三百周年纪念。我的史剧创作欲又有些蠢动了。我想把李岩与红娘子搬上舞台。因此我对于古代研究便生出了在此和它告别的意思。在这时早有过一个计划,想把性质相同的一些论文收集为一个专集,名为《先秦学说述林》,连《后叙》都写好了(二月二十日),而且发表过。这书在重庆的出版未能实现,后来我的计划也改变了。最近福建的东南出版社却照旧替我把它印行了出来,虽觉得多余,但也可以作为我并无留恋于古代研究之意的证据。

史剧没有写成功,想和古代研究告别也没有办到,这原因我在这儿可以不必缕述。但在这儿却须要提到的,不仅和古代研究告别没有成功,而研究的必要反更被促进了。主要的原因在上面已经提到过,是在这个期间之内有好几部新史学阵营里面的关于古史的著作出现,而见解却和我的不尽相同。主张周代是封建制度的朋友,依然照旧主张,而对于我的见解采取着一种类似抹杀的态度。这使我不平。尤其是当我的《墨子的思想》一文发表了之后,差不多普遍地受着非难,颇类于我是犯了众怒。这些立刻刺激了我。因为假如是不同道的人,要受他们的攻击,那是很平常的事;在同道的人中得不到谅解,甚至遭受敌视,那却是很令我不安。因此,我感觉着须得有一番总清算、总答复的必要。就这样彻底整理古代社会及其意识形

态的心向便更受了鼓舞。

四

一九四四年，我下乡比较往年早。在五月三十日，全家便又搬到了赖家桥的乡居。

下乡之后酝酿了一个月，到七月三日才“开始写《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》”。

起初我的计划是想由社会机构写到意识形态，一直写成一部长篇论文。但到后来我把这计划改变了。我想分成各个单独的论文来写，而综合起来却又可以成为条贯。我尽力地避免了讲义式或教科书式的体裁，而且想写得比较容易懂。但这后一种企图却没有十分达到：因为研讨的是古代的东西，反复征引古文，自然难免要具有晦涩的外貌和内容。不过我也不希望任何人都要阅读我这次的著作，只要是对古代的东西感兴趣的人，就稍微晦涩一点，我相信是不大要紧的。我们现在还没有达到可以下结论的时候，自然有时也不免要用辩论的笔调。这或许也就是不能写成为讲义式或教科书式的一种制约。

由七月三日起，到十八日止，把社会机构的一部分写完了。这一部分我就尽它占有了《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》的题名。中间虽然休息过几天，也还写过些别的文字，但我的意识主要是集中在这一一个问题上面的。

我在古代社会的机构上，除掉把我历来的意见综合地叙述出了之外，有了些重要的新的发扬。第一、我把井田制肯定了，由井田制如何转化而为庄园制，我也得到了较合理的阐明。第二，